2010～2011年度报告

巨轮上的中国

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

顶尖学者把脉蜕变中的世界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姚洋

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陈志武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李卫东

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郭于华

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2000～2030——胡光宏

11年中国外交：

大国外交经受考验的一年——叶自成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0～2011年度报告

巨轮上的中国

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

顶尖学者把脉蜕变中的世界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姚洋

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陈元武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季卫东

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郭于华

中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2000～2030——杨光斌

2011年中国外交

大国外交经受考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主编.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1.4

ISBN 978-7-80234-639-0

Ⅰ. 巨… Ⅱ. 中… Ⅲ. 国际形势—研究 Ⅳ. D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42257 号

书　　名：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
主　　编：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
出 版 发 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 准 书 号：ISBN 978-7-80234-639-0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720×1000mm　1/16
印　　张：10.75
字　　数：102 千字
版　　次：201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2.00 元

咨 询 电 话：（010）68990625　68990692
购 书 热 线：（010）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 子 邮 件：drcpub@126.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本书编委会

主　任：秦朝英

编　委：（排名不分前后）

秦朝英　姚　洋　陈志武

季卫东　郭于华　杨光斌

叶自成　包月阳　郭琼虎

我们的时代和我们的使命

（代前言）

2010年之后，哪怕最为平庸的观察者，即使他没有对世界历史大纵深和全球政治大格局有多少深入的研习，也大抵感受到国家发展的内在紧张和深化改革的现实困境，难免对于国家的前途与民族的未来忧心忡忡。

经过三十年来的经济腾飞和一百年来的制度探索，国家已经步入一个大价值认同和大规则确立的关键时期。然而，一个骨髓里的小农社会要完成现代转型，充满着太多的艰难与障碍。逆水行舟，不进则退。我们深信繁复的现实自有逻辑，饱含启示。它曲折，但方向恒定；它混乱，但又清晰可见。在此关乎国运的重要阶段，我们已经没有时间拖延，没有时间抱怨，选择阻力最小的系统性解决方案是当务之急。

认清位势，方能明晰目标。基于在浩荡历史长河面前诚惶诚恐的紧迫感，在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开篇之际，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推出了这份2010年年度报告。我们把它命题为《巨轮上的中国——当前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为什么定这个题目？自从1840年以来，中国就一直身处大国崛起、现代转型的大历史之中。经由几个重要时期的变迁，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考察，我们对当前大势有如下判断供各界同仁商榷：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第一，大趋势上，过度汲取、过度消费的工业文明疲态尽显，不断暴露出其所存在的重大缺失。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自然资源渐趋衰竭，生态环境明显退化，气候变化威胁人类生存等，依次成为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工业文明先天的基因缺陷；同时，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和新能源技术为代表的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服务经济的完善，开启了文明转型的内生需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新时期已见曙光。

第二，政治上，苍黄反复的革命哲学随着政治挂帅的运动时代早已渐行渐远，中国正告别一言九鼎的权威政治，迈向利益博弈的现代政治。政府运行模式发展的趋势正从“管理＋控制”向“管理＋服务”的模式转变。互联网的无中心模式和泥沙俱下的信息洪流，对新形势下的国家治理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从法制大国到法治大国的历程，则仍然任重而道远。

第三，经济上，改革开放的成就举世瞩目，但由于改革不彻底，导致利益分化严重，话语分歧日益明显。国内的发展模式滞后、地方债务、通货膨胀、地区差距、贫富不均、教育医疗住房就业等民生难题、劳工短缺和国际上的同质竞争、贸易争端、货币战争等问题复杂交织，中国经济危机并存，未来发展亦充满不确定性。

第四，社会上，一个夹杂着传统、现代和后现代的混杂时代出现。它们彼此割裂，但又如此紧密地塞在同一个容器中。在一个怨恨伦理和差序伦理的背景下，社会性的权利诉求与行政性的管制思维之间的碰撞日益成为矛盾的源泉。传统社会的结构失衡，阶层固化，社会矛盾多发，群体性事件上升，社会戾气充斥和信仰危机等问题渐困渐重，而新兴社会空间的自主性发展，对国家社会的良性互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五，外交上，传统的外交模式已经随着金融发展与技术进步而受到极大冲击，既有的边界和杠杆遭遇革命性的改变。军事与传统安全问题虽然仍旧是国际格局的重心，但新领域外交和公共外交已经是外交领域的新趋向。崛起的中国正直面国际社会的新一轮猜疑与防范，如何巩固传统盟友，开创外交新局，对执政者而言是不小的考验。

第六，技术上，由于多方面的原因，中国在工业革命和信息革命中一直处于被动或跟随地位，而目前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粮食、能源、环境和气候问题将倒逼出的新能源革命，为中国创造了超越的契机。历史上的每次重大转型时代，全新领域爆发的革命都是后发国家迅速崛起的最佳机会。中国若能积极作为，引领新一代能源和绿色革命潮流，主导全球新技术革命，将为中国在未来的发展创造先发优势，把握主动权和占领战略制高点。

第七，学术与文化上，中国部分学人因长期不能独立思考，并在各种现实利益上的依附性，随波逐流、各为其主的现象严重，没有使命感，没有目标，没有共识，很难发现真问题，提出真办法，更遑论产出原创性重大理论成果，进而实现文化输出，影响全球主流价值观。

尤其是刚刚过去的2010年，各方面矛盾深刻凸显。内外形势的紧迫，国家所面临的种种风险都迫切地需要我们注重探讨中国当前的大趋势与大动向。中国亟须对目前总体形势的深入评估及现代国家建设的总体性战略规划。惟其如此，才能妥善处理目前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使中国顺利完成全面转型，并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占据主动。

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拟定每年发布的《国际国内重大形势分析》年度报告，其目标是为国家战略制定者、政策制定者以及所有关心中华民族持久繁荣和长远福祉的有

志之士提供一份“价值方案”。这份方案既非单纯的建言文章，亦非单纯的学术辞章，而是基于独立思考、实证研究而对于我们目前所处位势的分析和国家战略的咨询方案。

本报告分为政治、经济（国内、国际）、法治、社会、外交五部分，每部分的作者均是目前华人世界的重量级学者。他们从各自的专业领域出发剖析现实、直击重点，进而提炼出可操作层面的战略定位和路径选择，不是虚玄的坐而论道、空泛的清流之语，而是着眼于夯实一座伟大建筑的思想基础，其观点或可商榷，但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拳拳之心青史可鉴。

作为长期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和中长期发展的顶级战略智囊库，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以深入研究利害循环变换线，寻找可能性空间与可行性空间的最佳对接，进而打造一个影响长远的战略研究学派为学术目标。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建党九十周年，也是“十二五”开局之年，本报告即是我们在这个意义深远的历史节点上的一个全新尝试。当然，效果如何还有待读者诸君评判。

不管世事如何演变，时间巨轮且自滚滚向前。体量无比庞大的中国，数十年来高速运行，已经形成了极其强大的惯性，每个人都被这股惯性带着不由自主地往前冲。急刹车或急转弯，都可能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如何能够以适当的速度安全平稳地前行，需要掌舵者对大局做出清晰的判断，需要理性的思辨水平、务实的操作手法和高超的政治智慧。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一代伟人早年发出的深沉叩问，惟具有大担当、大历史感的人士能够回答！

编者

2011 年 3 月

目录
CONTENTS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 / 1

本文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讨论政府行为是如何加剧结构失衡的。本文将中国政府概括为“生产型政府”，这种政府关注生产、忽视公共财政，从而更可能补贴生产者，降低消费者的福利，其结果是加剧结构失衡。其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个命题，即一个保持中立的政府，或称中性政府，才是中国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三是阐明结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契机。

——姚洋

发达国家债务与全球经济前景 / 21

全球经济预测背后存在许多隐患、忧虑，最大的可能是美国、日本、西欧国家的财政状况与主权债水平都接近或超过警戒线，而新兴市场经济又都面对通胀压力。那么，如何认识发达经济体的债务负担？它们的财政赤字和高负债是否会让其崩

溃，引发下一波金融危机？认清这些问题无疑是摸清、判断全球经济未来走向的关键。

——陈志武

中国法治向何处去 / 39

中国必须通过法治走向民主，而政治体制改革的起步阶段强调法治乃至宪政。宪政意味着在宪法至上的原则之下，通过司法审查的制度安排来切实保障人权、限制政府滥用权力的行为，逐步把国家活动都纳入法治的轨道。正是这种立宪主义意义上的法治的制度安排，才能使国家在增强执政合法性和社会整合性的同时，让民主政治这架精巧的机器真正有效地、稳定地运作起来。

——季卫东

百年中国社会进步之路 / 67

面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困境和社会生态恶化的严重态势，会有各种治理方略出台，但是错误的判断和错误的治世药方，常常是治标不治本，甚至是头痛医脚、脚痛医头，无异于画饼充饥甚至饮鸩止渴。中国社会的强权力、弱市场、无社会三个因素结合在一起，是社会生态恶化的根本原因。它造成特殊利益集团畸形发育，不公正的社会秩序得以形成。在此情况下，唯社会建设是公平正义得以实现的保证，重建社会或许是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唯一道路。

——郭于华

2011 年中国外交：大国外交经受考验的一年 / 87

2011 年，中国外交迎来了新的十年。在未来的十年中，国际格局分化重组充满了变数，国际社会的力量对比持续变化，中国要在波诡云谲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安全、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捍卫国家利益和人民权利，任重而道远。但是，长期以来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对外关系是以国家实力为基础的；应对外交中的种种考验与挑战，必须始终立足于中国自身的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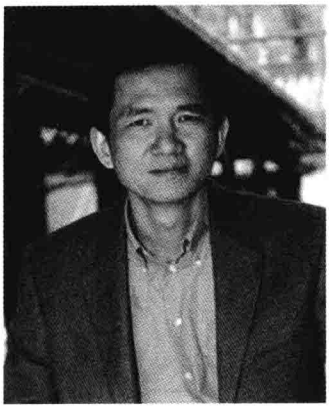
——叶自成 李亚男 蒋翊民

中国政治发展次序的战略选择：2000～2030 年 / 123

到 2030 年，如果公民的社会权利基本得到保障并因此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司法体制和行政体制为制度基础的法治体系得到改革和完善，“法治民主”就有了好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是一个村落而不单独是一座空空的大厦。至于说中国大陆地区未来的政体最终是协商基础上的选举民主还是竞争性民主，将取决于精英团体和民间社会的智慧。我相信，不管是什么样的民主形态，基本让人满意的民主政治将是一项漫长的世纪工程。对此，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思想准备。

——杨光斌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姚　洋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

姚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教授，《经济学季刊》主编。1964年生于西安。北京大学地理学学士，1989年获北京大学经济学硕士，199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农业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农业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兼任天则经济研究所特邀研究员，康奈尔大学经济和社会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著有《自由、公正和制度变迁》、《制度与效率——与诺斯对话》、《土地、制度和农业发展》、《作为制度创新过程的经济改革》、《转轨中国——审视社会公正和平等》（主编）等。

本文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讨论政府行为是如何加剧结构失衡的。本文将中国政府概括为“生产型政府”，这种政府关注生产、忽视公共财政，从而更可能补贴生产者，降低消费者的福利，其结果是加剧结构失衡。其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

梳理，并提出一个命题，即一个保持中立的政府，或称中性政府，才是中国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三是阐明，结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契机。

——姚洋

结构失衡与改革机遇

■姚　洋

一、引言

从1978年到20世纪末的这二十多年里，中国的主旋律是改革，经济增长的动力也主要来自改革。可以说，这二十多年的经济增长是“非常规的”，它源于改革所释放的能量，而不是经济增长所通常依赖的东西，如投资。进入21世纪之后，传统的改革议程如价格改革、企业改革和对外开放基本完成，中国经济增长趋向于常规化；就像其他东亚经济体一样，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于外延扩张，其中最重要的是出口的增长。出口的扩张帮助我国实现了超过10%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但同时也积累了严重的结构失衡问题，其主要表现是居民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前者有悖于经济增长的目的，后者意味着资源的浪费。这些问题的产生和中国的人口结构以及城乡关系有关，但是，体制的弊端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其起到了放大作用。传统改革只是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转型，而没有触及政府职能的转换问题；在过去的十年里，政府参与经济运作非但没有减少，而且还在增加。

与此同时，各种利益集团出现，并开始左右一些政府政策。这些变化使得政府政策更偏重于对生产者的保护，而忽视了民众福利的提高，从而加剧了结构失衡。

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是一个老话题，前三十年的改革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即市场（而不是政府）才是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手段。但是，自金融危机发生以来，这个答案受到了严重的挑战。在国际上哀鸿遍野的情况下，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保持了旺盛的增长势头，2009 年增速达到 8.7%，2010 年突破 10%。国内外普遍认为，这样的增长速度和政府主导的大规模投资分不开。由此，国内出现了一种看法，即中国以政府为主导的发展模式优于西方以市场为主导的发展模式。这种观点虽然没有得到西方人士的认同，但中国强劲的经济表现也让一些人对市场主导模式产生了怀疑。比如，曾经提出历史终结论的福山，最近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认为美式资本主义并不比中国式的政府主导的资本主义好。而奥巴马总统的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更直白，在孟买的一次讲话中明确表示，以市场为导向的“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了。同时，他认为中国的成功得益于国家主导的重商主义政策。但是，和福山不同，他没有夸奖中国的意思，而是认为，重商主义伤害了其他国家的发展，也限制了中国国内民众福利的改进。为此，他提出了“孟买共识”，即一种照顾民众福利改进的、民主的经济发展模式。换言之，他希望印度能够在民主条件下实现中国式的高速增长，从而证明“北京共识”在长期的失败。

事实上，中西方之间似乎正在形成一个意识形态分野。尽

管对自由放任资本主义产生了怀疑，市场经济仍然是西方意识形态的基调；在中国，对政府干预的认同却在加深。在这种情形下，西方的政策和知识界正在形成对中国的重估。过去，他们相信经济进步将让中国更像西方，遵守西方认同的市场规则；现在，他们对这个判断产生了怀疑。过去，他们相信示好中国将使得中国更加融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现在，他们更倾向于认为中国是一个搭便车者，对维护这个体系没有兴趣。如果中西之间的意识形态分野继续的话，西方对中国的重估就可能改变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

本文有三个目的。其一是讨论政府行为是如何加剧结构失衡的。本文将中国政府概括为“生产型政府”，这种政府关注生产、忽视公共财政，从而更可能补贴生产者，降低消费者的福利，其结果是加剧结构失衡。其二是对改革开放三十年政府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梳理，并提出一个命题，即一个保持中立的政府，或称中性政府，才是中国政府成功推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其三是阐明结构失衡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契机。

二、结构失衡的表现

结构失衡主要表现在居民收入和消费占 GDP 的比重持续下降以及巨额经常项目盈余及其低效利用。先看居民收入。经济增长的目标是提高民众的福利和幸福感。在过去的三十年里，中国在这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民众的收入大幅度提高。但

是，近十五年来，居民收入提高的速度低于人均 GDP 增长的速度，居民收入占 GDP 的比重逐年下降。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占的比重由 68% 下降到 50%；与此相对应的是，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占的比重分别上升了约 12 个百分点。清华大学白重恩教授等人的研究表明，居民收入比重下降主要是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尽管农业比重的下降可以部分解释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多数农业收入在统计上算作劳动者收入），但即使是在工业内部，劳动者工资占企业增加值的比重也在下降。

再看消费。居民收入比例的下降，必然导致消费比例的下降。自 80 年代初期以来，消费占 GDP 的比例一直在下降，尤其是 2000 年之后，消费的比例下降了近 15 个百分点，至 2008 年，仅占 GDP 的 47%。换言之，我国的国民储蓄率达到 53%，即超过一半的 GDP 是投资（资本形成）和净出口。2000 年以前消费比例的下降可以用收入的增长来解释（一般而言，收入增加导致储蓄率提高），但是，2000 年之后消费比例的迅速下降，肯定另有原因。

居民收入和消费比例的下降意味着民众福利没有和经济增长同步提高，反过来，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增长速度则高于 GDP 增长速度；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势必违反经济增长的初衷，而且会加剧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深化社会矛盾。经济增长是执政党的重要合法性来源之一，但是，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不能被广大民众所分享，这种合法性就会受到置疑。因此，调整经济结构，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